

论孟子精神的现代意义

王 小曼

On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Mencius spirits

WANG Xiaoman

Content Summary

On today whe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grates increasingly, holding a unique national tradition and the cultural spirit displays its huge value more and more. Then, what our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spirit is?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that Chinese society becoming modernization, what kind of a role should it take on? How the role plays? Why these questions become a hot spot that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 and the ordinary persons pay a great attention and ponder a lot in the nearly two years, should having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the positive sens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on the positive sense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Mencius spirit in coordina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pidly developing of matter and the malnutrition in spiritual domain in such a special environment and tim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ociety. This opinion is expatiated from these several aspects: Mencius's democracy consciousness; Mencius's self-consciousness and being mindful of danger as an intellectual; Mencius's independent spirit and the personality strength as an individual, as well as Mencius's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treating the interests.

目录：

- 一. 前言
- 二. 孟子的幸与不幸
- 三. 孟子的民主思想
- 四. 孟子的独立精神和人格力量
- 五. 孟子的现代精神——对待利的态度
- 六. 结语

一 前言

随着国学热的日益升温，“国学”、“儒学”成为了近两年来中国的媒体与百姓生活中频频出现的字眼。祭孔大典隆重举行，海外开办孔子学院，孔子标准像发布，孟母学堂在南京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中央电视台开设《论语》讲坛，《光明日报》开办“国学”专栏等等。在这片繁荣热闹的景象背后，是什么样的因素与动力在驱使与促进着呢？

跟五四时期以促成中国的现代性为目的的新旧之争所不同的是，当前的这场国学大讨论是为协调、解决中国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应运而生的。处在政治经济变革与转轨期的当今中国社会，前所未有地遭遇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急速发展的不和谐问题，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应该是当前这场国学“运动”发起的真正背景与目的。因此，传统“国学”与现代性之间不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如何协调、融合并互相促进的话题。

从另一个方面看，在经济生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中国人普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营养不足，人们急需在精神世界里寻求强大的依托，急需在传统中寻求一种支撑的力量。这种依托和力量的源泉无疑来自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自于古代先贤哲人合力建构的一套具有精神指导作用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

事实上，以儒道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生存了两千多年，一直是在一个封闭的封建社会体制下运行着，其积极意义在统治者个人利益的驾驭下并没有

得到发挥，而是被掩盖、扭曲，甚至被以某种歪曲的形式“发扬光大”。而上个世纪初，当整个世界陆续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文明的发展轨道之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遭遇强烈的批判和摈弃。此后的大半个世纪，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儒道传统几乎都被视作文明进步时代的绊脚石而被人们遗忘、抛弃。

只有当时代步入到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人们才突然发觉，在这个时代保持一份独有的传统和文化精神是多么的可贵。那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什么？在中国社会日益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它应该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近两年里成为知识界乃至普通有识之士普遍关注和思考的热点，显然是合理的，并且也是值得鼓励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也有了参与这一“国学”讨论的一点冲动，试图在此探讨一下孟子的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和人生启示。

二

孟子的幸与不幸

孟子一生活动的年代大约处于战国中期，年轻时曾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学习。孔子的学说、思想和人生态度，给孟子以极大的影响。他悉心钻研孔子思想，是孔子思想和政治主张的继承者、发扬者，也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大师和代表人物。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曾经游说齐国、宋国、滕国、魏国等诸侯国，但他的主张始终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未被采纳。于是回到故国，聚众讲学、著书立说，与万章、公孙丑等门徒为《诗》、《书》等经书作序，传达孔子的思想，并完成了《孟子》七章。

孟子不仅是孔子思想衣钵的继承者，而且他求仕的行为方式及悲剧结局也与孔子十分相似。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则是一心实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的逆境成才论，他明知王道仁政的儒家学说对于一心武力争霸、开拓疆土的诸侯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却仍旧一而再、再而三地辗转于各诸侯国，固执地宣讲他的治国思想。长期奔波、居无定所的求仕路上，常常是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而除了肉体的折

磨，孟子还要面对诸侯的质疑和其他学派的非难。孟子提倡仁政，但当时的儒家思想尚未获得受人尊崇的地位，在诸侯眼中，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繁琐的礼仪、言必称尧舜的泥古都是迂阔而不实用的。虽然靠“轻徭薄役”来获取民心，是个不错的治国之术，但在混战年代，急功近利的诸侯们更青睐法家严刑峻法的统治术，纵横家的游说之术，而很少有诸侯会愿意耗费时间、精力让孟子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仁政的试验。

正因为此，孟子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情节。不但生前不得志，甚至死后也遭受过很多反对者的攻击。早在汉代，孟子就成了一些人讽刺的对象，王充在他的《论衡》一文中专门辟出了《刺孟》篇，讽刺孟子是庸俗的儒者，没有什么可值得敬重的。唐太宗尊崇儒学，尊孔子为先圣，孔子的弟子颜渊为先师，可是同时配享孔庙的二十一人中，却没有孟子的名字。到了宋代，有的人居然以骂孟子为时尚。当时有个叫李觏的著名儒学家，一向讨厌佛学，也讨厌孟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骂佛和骂孟子。明代贬损孟子的现象就更典型了：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心胸狭窄、刚愎自用的专制皇帝，他因为读到《孟子》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及“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等章句而恼羞成怒，对孟子恨之入骨，以至于下令撤销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大学士刘三吾审查《孟子》，删去原书中所谓的“反动言论”共八十五条，编成了《孟子节文》，而且《孟子》原书也不再作为科举考试的命题内容。

孟子如此遭人憎恨，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孟子思想中有太多不符合专制统治者利益的内容。比如提倡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主张民贵君轻，强调民本意识等等，都是专制君主和达官权贵们所无法容忍的。对于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来说，君权是至高无上的，天下百姓不过是他私有财产，可随意生杀予夺。而孟子却公然抵触这千古不变的封建伦常，说“汤武革命”是正义的行为，桀纣之流是民贼独夫，这几乎等同于号召普通民众忘却“君臣大义”，随时起来反抗啊，怎能不遭君主权贵们痛恨呢？

幸运的是，孟子生活在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思想言论比较自由的战国时代，在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时期还没有到来之前，那是一个自由、开放，生命力、创造力和智力都得到空前发展的时代，空前活跃的思想观念和言论也出现在这个时

代。君臣关系也不似秦汉以降专制极权下的高高在上与绝对服从，开放、自由的空气，使得各国君主的身边知识分子荟萃，闪耀着思想光芒的自由言论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因此，尽管孟子的言论有不少威胁到封建君主的权威和利益，但是在他生前并没有遭受什么厄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在他死后，后世被人咒骂、讽刺、毁损，也都是几百年甚至千年之后了，不可能对孟子造成什么伤害了。所以说，孟子生前尽管不得志，但也还算是幸运的。

三

孟子的民主思想

孟子身后虽屡遭贬抑，但同时，他的地位也一直处在一个提升的过程中。比如汉代，汉孝文帝设置了《孟子》博士这一学官，专管《孟子》这部书的学习和传授。唐代末年的韩愈把孟子看作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说“道统”因为孟子去世而没有得到流传，《孟子》的地位这时开始得到了重视。到了宋代，孟子的地位开始正式上升。北宋的宰相王安石是变法的领袖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使孟子的升格运动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孟子》由原来的诸子百家著作升格为儒家经典著作，被列入《十三经》中。不仅如此，《孟子》还首次被列入了科举考试，孟子像被立于朝廷，孟子被封为邹国公，允许配享孔庙。这样，孟子就成为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学者，地位大大提高了。南宋时期，孟子升格运动已经进入尾声，尊孟成为了流行的学术倾向。朱熹用一生精力注成了《孟子》，及《论语》、《大学》、《中庸》，并将它们合在一起，并称为《四书》，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必读书目，也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到这个时候，《孟子》的经典地位才基本确立。元、明、清三代，《四书》都被确定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成了学者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必备工具。

1083年，孟子被宋神宗封为“邹国公”。1331年，又被元文宗加封为“邹国亚圣公”，乃至今天仍被世人尊称为“亚圣”。孟子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身后若干年，他会被推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而昔日被众诸侯不屑一顾的言论也变成了儒生眼中的宝典，成了广大儒生顶礼膜拜的对象。

后世统治者为什么会如此青睐孟子呢？事实上，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学之所以成为汉代以后特别是唐宋等历代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对正义观念的选择。西汉董仲舒劝说武帝独尊儒术的基本逻辑，就是强调儒术于民众、于国家有利，从而于根本上合乎皇家的利益，合乎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严格遵守孔孟之道，而是把它当作一种门面和装饰，背地里阳儒阴法、明儒暗法的事例不计其数。

儒家思想中有一个内容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是很深刻的，那就是“三纲五常”，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但孟子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有着与传统儒家的忠君理念相悖的观点。在他看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众的利益高于国家社稷，更高于君主。君的利益要与民的利益、国的利益相一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所以，臣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君臣的相处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君主的行为一定要符合仁的要求、礼的规范，“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君主无道，臣民不仅可以抛弃他，甚至可以推翻他诛灭他。商纣王是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孟子就认为伐得对：“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吾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

这些言论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们仍然会佩服孟子的大胆。他直接地指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驾驭与效忠，而是要视对待对方的态度而定。事君以忠，是事君的态度；事君以义，是事君的原则。君主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但臣下也有选择君主的权利。君主臣子都是人，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孟子一方面坚持维护人性的尊严，一方面也在传达着一个信息，即君主如果不走仁道，总有一天会被他的臣下遗弃。不用说当时听了这话的齐宣王很不高兴，就是几百年后，当明朝皇帝朱元璋读到《孟子》的这一段话时，据说也是“龙颜大怒，拍案而起”，操起毛笔就在《孟子》书上胡乱涂抹，以宣泄自己的愤怒。

孟子主张君臣关系应以道义为基础，体现了君臣某种程度的“对等”关系。

在今天看来，这是民主思想的端倪，在两千年前的封建时代实属难能可贵。

四

儒家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和忧患意识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相当鲜明的人道主义特征。不仅如此，他还像孔子一样，“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下》），身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人生抱负，并慷慨地宣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这种坚定自信、不畏不惧的态度代表着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意识——道尊于势。

实际上孟子也是如此身体力行的。大约从四十三岁起，他就奔走于邹、齐、鲁、宋、梁、滕等国之间，尽管其思想主张与战国时代征战攻伐、崇尚武力的时代风气和历史潮流不相吻合，但他仍然不断向各诸侯宣讲自己的仁义学说，锲而不舍，直至七十余岁、年老体衰之时，方才退而返乡，与万章等门徒著书立说。

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精神，是儒家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内容之一。它蕴含着一种宏伟的人生理想，即自觉地把为天下人谋福祉当作自己人生的崇高责任和使命，并为此而不懈追求。后世文人所说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都是对这种人生理念的绝好诠释。孟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儒家的这种人生理想和思想精神，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儒家思想的这一内容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让每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都能自觉地从内在要求出发去做自己有责任做的事情。即便世道不古、礼崩乐坏，也仍然能够找到行动的方向和力量。这种发自内心的以天下为己任，以拯救世道人心为使命的精神，是儒家闪耀着最明亮的人文主义光辉的思想。它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我们没有借口去推卸自己的天赋使命和义务，也没有理由坐视社会道德的沦丧而袖手旁观，更不能自甘堕落，与卑下、低俗的时代风气同流合污。哪怕个人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小，我们也不应该放弃振臂

高呼的责任。

孟子曾说：“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忧的是如何能做到像舜这样的圣人之所言所行；不忧的是一般常人所担忧的朝夕祸患。他还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种忧患意识其实就是一种生存的危机感，它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不断进取、奋力拼搏，不被安逸享乐牵绊住前进的步伐。这一点不仅对个人，乃至对一个国家都具有很强的警醒作用。孟子举了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圣人贤达的例子为证，说明他们最初都是在艰苦困顿之中，磨砺了人生，锻炼了品格，坚强了意志，从而能在日后大有作为，做出成绩。

其实，人在困窘潦倒的境遇中能够胸怀抱负，不畏困苦，是不难做到的；难就难在身处安逸舒适、无忧无虑的环境中还要时时牢记着奋发向上，不断进取。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的历史故事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世界强国之间其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要缩短这一差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不会沾沾自喜于眼前的一点小小的成绩，而忘记了自强不息、忧患以生的古训。人的成长乃至民族、国家的发展其实有着同样的规律。因此，孟子提倡的忧患精神和自强意识，理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五

孟子的独立精神和人格力量

孟子的求仕道路充满崎岖坎坷，学术思想横遭质疑非难，但凭借汪洋恣肆的论辩才华，他仍在人才济济的当时脱颖而出，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离实现其社会理想仅一步之遥。如果孟子识实务、知进退，凭他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他完全可以在齐国安顿下来，尽享荣华富贵。可惜孟子偏偏不识抬举，仅仅因为其治国思想未予实施，因为诸侯的一时冷落，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轻易放弃。

《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孟子正要去朝见齐宣王，而齐宣

王也正好派人来传话，称自己受了风寒，不能亲自拜访孟子，希望孟子能去朝廷觐见。想不到孟子听了这话居然回答说：“不巧我也生病了，不能到宫廷里去。”齐宣王听说孟子病了，派人来问候，连医生也带来了。孟子却说：“昨天得了点小毛病，不能去朝见大王。今天病稍有好转，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宣王接着又派人在孟子回家的路上拦截他，并劝他赶紧去朝廷。孟子没办法，就躲到齐国大夫景丑家过夜。景丑对孟子的行为很看不惯，说：“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父子之间要慈爱，君臣之间要尊敬。但我好像只看见齐王尊敬你，没有看见你怎么恭敬齐王。”

孟子趁机给景丑上了一课。他说，想要建立功业的君王都有召见而不去的大臣，有什么事要和他商量就应该主动去拜访。他对道德的尊敬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就不会有大的作为。商汤对于伊尹，桓公对于管仲，都是这样，所以他们不用费心就能称王天下、称霸诸侯。当年齐桓公是不敢召见管仲的，如果连管仲都不能召见，何况他孟子这个看不起管仲的人呢？

孟子认为，君臣的关系不应该只注重外在的礼节等形式，而应该建立在共同努力治理朝政的基础上。作为君主，应该崇尚美德，尊重贤士，才有可能建立伟大的功业。这些观点，在强调礼制的儒家思想中可谓独树一帜。

君王亲自召见，一般的人谁不是求之不得，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唯恐辜负了君主的一番美意？唯有孟子却要求君主把自己当成召见而不去的大臣，以此来显示君主的贤德，难怪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孟子迂腐而不识时务，他的这种自负被视为狷狂也就毫不足奇了。

孟子为推行其政治主张曾不遗余力地辛劳奔波，但面对强势、权力却又丝毫不肯暂时性地放弃自己的原则，委屈自己的人格，而是执著地坚持着大丈夫的倨傲形象。弟子陈代对孟子坚持原则，不得到合乎礼仪的邀请就不去见诸侯的行为也不太理解，觉得老师可以在礼仪的问题上暂且委屈一下。要是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那样，以“妾妇之道”博得诸侯们的好感，游说他们，弄得好可以称王天下，弄不好也可以称霸诸侯，劝孟子“枉尺而直寻”，以屈求伸，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但孟子坚决不同意，并严肃地指出了陈代的错误之处。如果一开始就在礼仪、道义这样的原则问题上让步，那又怎么能达到远大的目标呢？孟子

坚持原则，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这是通往崇高理想必须具备的精神。做不到这一点，又拿什么去教育别人、帮助别人走正道呢？

在《孟子·告子上》第十章里，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时，宁可舍弃生命以追求道义的人生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段话遂成为后世千古传颂的名言。

的确，当有了崇高的道义追求，有了崇高的精神境界，人们就能自主自由地、合乎礼义地对待外界的种种利诱或威逼了。而面对义利的严重冲突，人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滕文公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尽心上》），直至舍生取义、以身殉道，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就要有这样顶天立地的品格和气势，所谓的孟子精神也就是指这一点。

在一个只崇拜强权不注重道德的时代，孟子的这番话流露出来的大丈夫气概，令无数政客、纵横家们黯然失色。纵观浩瀚的历史长河，无数文人在君王面前投其所好、阿谀奉迎、谄媚拍马；在政敌面前，不择手段，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投身于权力之争，身陷名利的泥潭而不自知，完全丧失了士大夫的操守，如孟子般坚持操守者，实在寥寥无几。

正因为如此，孟子这种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范、“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人格、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才显得如此的珍贵与不凡。这一点，不仅对后世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震撼力。继承和光大孟子这种独立精神和人格风范，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无疑有着非凡的意义。

六

孟子的现代精神——对待利的态度

孟子的弟子陈臻曾经这么问孟子：“当年您在齐国，齐王送您上好的黄金一

百镒，您不接受。后来您到了宋国，宋王送您黄金七十镒，您却又接受了。在薛国的时候，薛君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先前不接受是对的，那后来接受就是错的；如果后来收下是对的，那先前不接受就是错的。这两种情况，老师您必定属于其中一种。”

孟子平静地回答说：“我接受和不接受都是对的。在宋国时，我将要远行，对远行者必定要送礼物。宋君说这是赠送给我的礼物，我为什么不接受呢？在薛地时，我需要警卫，薛君说这是给警卫士兵的给养，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而在齐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没有原因地送我礼物，实际上是用钱收买我。君子怎么可以被金钱收买呢？”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的行为是这句古训的最好诠释。君子对于礼物不以多少来确定接受不接受，而是以是否符合道理来决定该不该取。符合道理的话，虽然菲薄，也该接受；违背道义收取钱财，那是接受贿赂，君子也就不成为君子了。孟子所言所行，坦坦荡荡，率真可爱，正是他一贯的大丈夫精神。

同时，孟子也强调，食、色固然是人的本性，但如果跟礼义相比，那显然是微不足道的。面对人们日益追求物质利益，忽略道德培养的时弊，孟子曾经痛心疾首地感叹：人总是懂得爱惜自己，但问题是爱惜自己的什么呢？是名利？生理感官的享受？还是有更值得爱惜的东西呢？儒家本排斥为了生计而出任官职，如果确实有生计问题，那就不要谋取高位厚禄，只要够维持生活的职务就行了，这时候当然也谈不上施行大道。反过来说，如果任职不是为了生计，那么就要努力施行大道，做不到的话，就是最大的失职。因此，在齐国多年的孟子，虽然已经身居客卿的高位，却依然不顾齐宣王的再三挽留，辞去了十万钟俸禄的官位，离开了齐国。

孟子的行为始终贯彻着这样一种准则：不符合道德要求的，那怕再少，也不能给予别人或取于别人。而对于符合道德要求的利益，孟子认为自己获取多少或给予别人多少，都不过分。如果人们面对利益的给予和获取时都能将义放在前面，从内心培养一种“尊德乐义”的道德情感，那么他就能做到“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不义之室而不居也”。

孟子对待利的态度淡泊、豁达而健康，这对医治现代社会所谓“物欲横流”

的精神疾病可以说是一剂良药。现代人应该从孟子对待利益的言行中获得很多的启示和感悟。人活在世上固然都有物质上的需求，都需要利益，但是决不能为物所役，沦为物质欲望的奴隶，那样的话，就会丧失心志的养护，丧失心灵的自由，最终丧失自我，丧失真正的自由与幸福。如何修养自己的德性和品行，在符合法律、道德要求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从更高层次上追求一种高尚的生命境界，这的确是值得现代人认真思考的一个课题。

结语

孟子的人生精神丰富而深厚，是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文精神的代表，是中国古典文明孕育而成的绚丽硕果，也是秦汉以后中国人文精神和民族性格发展的重要源泉。它同先秦和秦汉以后其他思想学派的人文精神一起，共同成为中国的民族精神赖以建构和发展的宝贵资源。

孟子依循内圣外王的思路构筑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既肯定治国平天下的功利价值，又重视修身养性的内在道德价值。他寄托于圣君贤臣身上的仁政理想，充满了对普通民众的人文关怀。他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力量的自信，“万物皆备于我”的豪迈，都令我们现代人充满敬意。他有血有肉、可敬可爱，洋溢着一种鼓舞人心的英雄般的人格魅力。

作为儒家“亚圣”，孟子对历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启发了历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尊严意识和叛逆精神，成为了他们批判现实、抨击苛政、为民请命、改良社会的思想武器和精神资源。这一笔巨大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去挖掘、开发。

参考资料

1. 《论孟子的人生精神》 林桂榛 《光明日报》2000年6月13日B3版（理论周刊·学术）
2. 《孟子的人文精神》 杜维明 《新语文学学习》2007，1-2
3. 《孟子旁通》 南怀瑾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3月